



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 经济形态的变迁及意义

■文/ (美国) 焦天龙

一 前言

与内陆地区相比较,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的变化经历了不同的过程,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海洋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由于濒临太平洋,适应海洋、从海洋中获取食物资源是福建沿海史前文化的特色之一。

研究海洋经济的发源和发展过程,对于探讨中国东南地区海洋文化和航海术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是国际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因此该地区史前经济的发展变化和人群移动之间的关系,又倍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原因可能是促使南岛语族的祖先向太平洋扩散的动机或动机之一。譬如贝尔伍德认为,稻作农业的传播所导致的人口增长是原南岛语族从中国东南沿海向外扩散的根本原因^[1]。张光直先生则提出对海外稀奇物品的追求和贸易活动是原南岛语族祖先向太平洋迁徙的重要动机^[2]。臧振华先生则主张东南沿海在新石器时代所发展出的特殊的海洋适应形态,是南岛语族扩散的根本原因^[3]。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福建沿海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界的“边缘地区”,考古学的基础工作一直很薄弱,经过科学的系统发掘的考古遗址很少。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学术界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认识。从2002年开始,作为探讨东南海洋文化和南岛语族起源扩散关系的课题的一部分,我们与福建博物院合作进行了系列研究课题,其中经济形态的变化过程是重要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既包括对食物种类和获取食物方式的探讨,也包括对交换和贸易活动的研究。研究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新发掘的、经过系统采集的资料,同时也对部分原来发掘的材料进行了再研究。研究方法除了常用的动物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的方法外,还采用了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分析技术对有关标本进行了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已经用中、英文发表,还有部分成果正在整理之中^[4]。本文主要是对这些成果的综合介绍,重点是探讨海洋经济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对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南岛语族扩散的经济背景进行讨论。

二 福建史前海洋经济的初始：壳丘头文化

福建史前海洋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整个中国东南沿海的史前文化变迁息息相关的^[5]。已有的考古材料表明，从距今8000年左右的跨湖桥文化开始，东南沿海的居民开始利用海洋、认识海洋。以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5000~7000 BP）为代表的早期海洋文化，已经具备了初步适应海洋的能力。虽然考古材料表明其主要的生计形态是以种植水稻和狩猎采集陆生动植物为主，但海洋生物的获取已经是经济活动的重要成份。到了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阶段，航海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相当部分居民以海岛为家。目前发现在浙江东部沿海和舟山群岛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基本上是河姆渡文化三、四期的遗址，表明在河姆渡文化晚期，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沿着海岸线向东南扩散。据调查，最南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经分布到了温州一带^[6]。而能够以海岛为家，并沿海扩散，表明河姆渡晚期已经发展出了相当水平的航海术。

河姆渡文化向东南沿海的扩散，是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大事件，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转折点。有迹象表明，福建沿海和台湾海峡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端，很有可能和河姆渡文化的扩散有关。福建沿海目前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壳丘头文化，距今约5500~6500年左右。根据陶器、石器和玉器等遗物的形态对比，我们曾经提出这一文化的源头很可能与南迁的河姆渡文化有关^[7]。

福建省博物馆于1985~1986年对壳丘头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确认了其文化内涵是福建沿海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将其年代定在距今5000~6000年左右。由于地处台湾海峡西岸，壳丘头文化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壳丘头文化与台湾地区大坌坑文化的关系成为讨论的热点。包括张光直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壳丘头文化是大坌坑文化的重要源头或源头之一^[8]。

2004年，我们对壳丘头遗址进行了小规模采样发掘，系统采集了动植物和测年标本。除了进一步将其年代

确定在距今5500~6500年，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壳丘头文化的经济形态已基本上以海洋捕捞为主^[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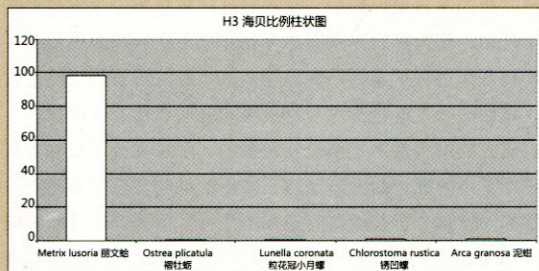
壳丘头是典型的贝丘遗址，主要文化层的堆积80%以上为贝壳，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贝壳坑。居民采集的海贝有19种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为丽文蛤。根据T503SE的统计，丽文蛤在C层和D层的比例，无论以重量还是以标本数来统计，都在60%以上（表一）。其次为褶牡蛎，若以重量为标准，占总数的21~22%左右。其他海贝的数量相当少。

以丽文蛤为主要采集对象是壳丘头遗址居民采贝策略的重要特点。这一现象在贝壳坑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以2004年发掘的贝壳坑H3为例，丽文蛤的比例高达98%以上（表二，图一）。这种贝壳坑多是当时人一次或短时间内食用的海贝的废弃物，充分反映了其采集海贝的选择性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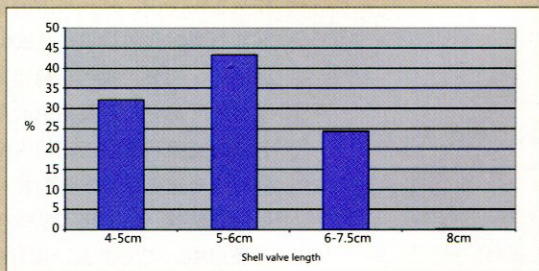
我们对H3出土的丽文蛤进行了进一步的大小统计分析（图二）。以海贝的长度为标准，43.3%的贝壳长度在5~6厘米之间，32%的贝壳长度在4~5厘米之间，而长度在6厘米以上者则很少。目前还无法断定这一比例分布反映了壳丘头先民有意识的采集行为还是丽文蛤自然生长的结果。不过，大贝壳很少似乎表明当时人对丽文蛤的集中采集，已经严重影响了丽文蛤的自然生长规律，人为的捕捞业已经存在。

壳丘头遗址中还出土了较丰富的海洋鱼类骨骼，经李恒悌博士鉴定，有石斑鱼和隆头鱼等。1985年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海龟和鲸鱼的骨骼。陆生动物骨骼较少，主要是鹿类动物，包括水鹿、梅花鹿、赤鹿等。也发现了少量的猪骨，可能为家养动物。

尽管我们在发掘过程中进行了系统的水选，但没能发现任何农作物的种子。对部分土样进行的植硅石分析，目前结果还没有出来。所以，壳丘头文化是否有稻作农业，目前还不能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农业生产在经济活动中是不占主要地位的。壳丘头文化的居民主要以海洋捕捞为生，海洋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态。



图一 壳丘头H3海贝种属比例柱状图



图二 壳丘头H3丽文蛤长度比例柱状图

表一 壳丘头遗址T503SE海贝统计表

	C层				D层			
	重量 (克)	比例 (%)	标本数 (NISP)	比例 (%)	重量 (克)	比例 (%)	标本数 (NISP)	比例 (%)
Metrix lusoria 丽文蛤	3900	61	490	66	1550	58	180	60
Ostrea plicatula 褶牡蛎	1350	21	102	14	800	30	67	22
Lunella coronata 粒花冠小月螺	356	6	58	8	60	2	15	5
Gomphina aequilicra 等边浅蛤	300	5	29	4	80	3	11	4
Arca granosa 泥蚶	111	2	17	2	38	1	9	3
Corbicula sp. 海蚶	71	1	19	3	22	1	4	1
Thais hippocastanum 多角荔枝螺	80	1	8	1	38	1	4	1
Hemifusus tuba 管角螺	58	1	4	1	38	1	1	
Nevita albicilla 渔舟蛸螺	2		1					
Cymbium melo 瓜螺	5		1					
Chlorostoma rustica 锈凹螺	34	0.5	5	1	32		4	
Operculum of Turbinidae 螺螺厣	14		2		10		1	
Turbo articulatus 节蛸螺	66		1					
Cerithidea cingulata 珠带拟蟹守螺	3		1					
Nerita polita Linnaeus 锦蛸螺	3		1					
Barbatia virescens 舟青蚶					5		2	
Mytilus coruscus 厚壳贻贝	17		3					
Arca sp. 一种蚶	46		1		3		1	
Cypraea sp. 一种海贝					17		1	
总计	6416(克)		743(个)		2693(克)		300(个)	

表二 壳丘头遗址T503SE海贝统计表

	重量 (克)	比例 (%)	标本数 (NISP)	比例 (%)
Metrix lusoria 丽文蛤	5000	98	349	96
Ostrea plicatula 褶牡蛎	18	0.3	2	0.5
Lunella coronata 粒花冠小月螺	18	0.3	3	0.8
Arca granosa 泥蚶	30	0.6	1	
Thais hippocastanum 多角荔枝螺	12		1	
Chlorostoma rustica 锈凹螺	42	0.8	6	1.6
Barbatia virescens 舟青蚶	5		2	
总计	5125(克)		364(个)	

三 福建沿海海洋经济的分化：大帽山文化与县石山文化

在壳丘头文化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出现了区域分化。其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县石山文化为代表，其南部地区以大帽山文化为代表。根据最新的测年数据，这两个文化基本上同时，都在距今4300~5000年左右^[10]。在文化形态上，二者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区别是主要的。在经济形态上，由于大帽山地处海岛，县石山地处海岸，两地的经济成份也出现了差别。海岸居民如县石山，海洋经济与农业经济并存。海岛居民如大帽山则基本上以海为生，不从事任何农业活动。大帽山居民的航海术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居民能够经常穿越台湾海峡^[11]。

大帽山文化

大帽山遗址位于福建省东山岛南端。遗址发现于1986年，之后福建省、漳州市考古工作者先后做过多次调查。2002年11~12月和2006年5~7月，我们对大帽山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两次发掘面积共约130平方米。由于在发掘过程中系统采取了筛选和水选等采样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则尽可能从多学科的角度提取信息，大帽山遗址的这两次发掘面积虽小，但却获得了大量的材料^[12]。

大帽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300~5000年左右。由于地处海岛，大帽山文化在生计形态上表现出很强烈的海洋经济特征。同时，狩猎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活动之一。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海洋动物和陆生动物的遗骸充分表明了这

一点。我们虽然对堆积进行了水选，并对部分土样进行了植硅石分析，但均未发现任何植物食物如水稻等的遗存。目前的材料不足以表明大帽山居民是否从事稻作业。

遗址中发现的陆生脊椎动物的遗存主要为少量牙齿和大量肢骨碎片，能观察属种的均为鹿类遗骨，主要有斑鹿和小鹿。还有少量禽类碎骨。遗骨非常破碎，有少量被火烧过，两次发掘所发现的陆生哺乳动物遗骨均很破碎，从破碎骨片观察，大量骨片均有加工痕迹，可能主要由加工骨器造成的，发生但也不排除有敲骨吸髓的可能性。

海生鱼类骨骼绝大部分为鱼的脊椎骨，以软骨鱼类为多数，主要是鲨鱼，部分鱼的脊椎骨有被火烧过。另外也发现有海豚和鲸鱼的骨骼。

大帽山遗址出土的海贝非常丰富。经鉴定，当时居民采集的海贝有30种，绝大多数生活在潮间带的泥滩、沙底里、海岸岩石缝或礁石上。我们对部分探方和遗迹的贝壳进行了系统采集，对其种属和大小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泥蚶(*Tegillarca granosa*, 68%)和丽文蛤(*Metrix lusoria*, 11%)是两种主要采食的贝类动物。从发掘过程中对地层堆积的观察看，在某些地方的堆积均为泥蚶，而在有些地方则几乎全为丽文蛤。这些堆积是大帽山新石器时代居民在一定时间段内吃食海贝后的废弃物，有些堆积可能就是一性消费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研究大帽山新石器时代居民采贝的季节性，我和李匡悌博士合作，对泥蚶和丽文蛤进行了¹³C和

表三 大帽山T3(2)出土泥蚶(1~2号)¹³C和¹⁸O同位素

Sample No	Dist	¹³ C	¹⁸ O	Sample No	Dist	¹³ C	¹⁸ O	
T3_2_ML01	0	0.34	-0.84	T3_2_ML02	0	0.46	-1.59	
Clam 1	5	0.33	-0.91	Clam 2	5	0.84	-2.48	
	10	0.14	-2.28		10	1.16	-0.87	
	15	0.79	-2.02		15	1.13	-1.55	
	20	0.79	-2.03		20	1.20	-1.63	
	25	0.64	-1.23		25	1.01	-1.77	
	30	0.87	-2.57		30	0.94	-2.48	
	35	-0.37	-4.68		35	1.48	-1.98	
	40	0.72	-2.22		40	1.18	-0.62	
	45	0.49	-0.99		45	1.00	-1.82	
	50	0.56	-2.22		50	0.67	-2.81	
	55	0.65	-2.00		55	0.92	-2.07	
	60	0.48	-2.43		60	1.41	-1.83	
	65	0.51	-1.98					
	70	0.70	-1.52					
Max		0.80	-0.84	Max		1.48	-0.62	
Min		-0.37	-4.68	Min		0.46	-2.81	
Range		1.18	3.85	Range		1.03	2.91	
Average		0.50	-2.06	Average		1.03	-1.81	

表四 大帽山T3(2)出土丽文蛤(1~2号)¹³C和¹⁸O同位素

Sample No	Dist	¹³ C	¹⁸ O	Sample No	Dist	¹³ C	¹⁸ O
T3_TG01	0	-2.29	-2.76	T3_TG02	0	-1.08	-3.30
Arc 1	5	-2.02	-1.92	Arc 2	5	-1.05	-2.48
	10	-2.15	-3.09		10	-1.26	-2.33
	15	-2.51	-2.56		15	-1.22	-3.11
	20	-1.34	-1.44		20	-1.58	-3.04
	25	-2.51	-3.07		25	-1.84	-0.87
	30	-2.02	-2.67		30	-1.31	-3.21
	35	-2.36	-2.29		35	-0.84	-2.58
	40	-0.69	-1.93		40	-0.67	-2.79
Max		-0.69	-1.44	Max		-0.67	-0.87
Min		-2.92	-3.09	Min		-1.84	-3.30
Range		2.23	1.65	Range		1.17	2.43
Average		-2.06	-2.41	Average		-1.21	-2.67

表五 大帽山T3(2)出土泥蚶(3号)和丽文蛤(3号)¹³C和¹⁸O同位素

Sample No	Dist	¹³ C	¹⁸ O	Sample No	Dist	¹³ C	¹⁸ O
T3_2_ML03	0	0.92	-0.96	T3_TG03	0	-1.26	-3.19
Clam 3	5	0.79	-2.85	Arc 3	5	-1.29	-2.46
	10	1.15	-0.74		10	-1.19	-2.14
	15	0.87	-2.19		15	-2.40	-1.90
	20	0.94	-2.19		20	-1.71	-2.05
	25	1.07	-1.33		25	-1.70	-2.93
	30	0.89	-1.36		30	-1.08	-2.56
	35	1.18	-2.67		35	-1.65	-2.78
	40	0.08	-2.34		40	-1.51	-2.33
	45	0.79	-2.78				
	50	0.65	-2.16				
	55	0.76	-1.02	Max		-1.08	-1.90
	60	1.28	-1.17	Min		-2.40	-3.19
Max		1.28	-0.74	Range		1.31	1.29
Min		0.08	-2.85	Average		-1.53	-2.48
Range		1.20	2.12				
Average		0.87	-1.83				

¹⁸O同位素分析^[13]。我们分析的贝壳标本包括3个泥蚶和3个丽文蛤,均出土于探方T3的第2层。其测定数据分别见表三、表四和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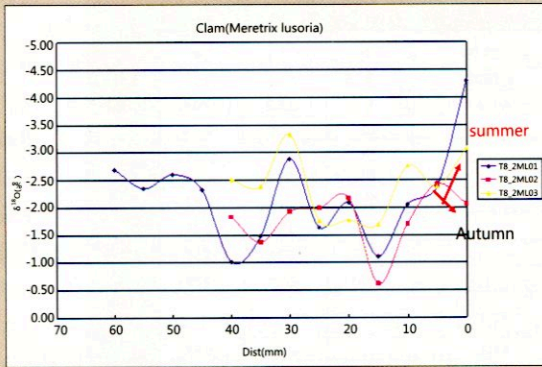
大帽山遗址的陶器与澎湖群岛和台湾本岛的很多遗址的陶器,有很强的相似性。如均以红陶或红褐陶为主,器类以豆、罐和釜为主,纹饰以绳纹、刻划纹和锯齿纹为主等。我们对大帽山出土的石铸进行的产地研究表明,其原材料绝大部分来自澎湖群岛^[14]。这些迹象表明,大帽山文化的居民已经有足够的航海能力和技术穿越台湾海峡,

海峡两岸的居民在这一时期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这些材料都进一步表明,大帽山文化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海洋适应能力的海岛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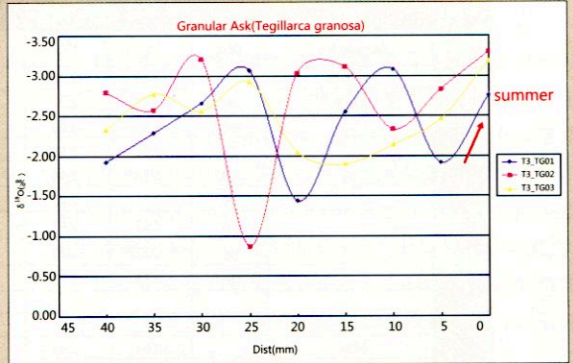
昙石山文化

位于闽江口的昙石山遗址自1954年首次发掘以来,目前已经进行了10次发掘。以该遗址中下层为代表的文化是昙石山文化的主体,目前主要分布在闽江下游地区。其年代为距今4300~5000年左右,与大帽山文化基本同时^[15]。

由于发掘材料的局限性,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昙石山文



图三 大帽山T3(2) 丽文蛤采集季节分析图



图四 大帽山T3(2) 泥蚶采集季节分析图

化的经济形态不能清楚地进行描述。在2003年的第九次发掘中，由于进行了系统的水选，发现了炭化的水稻粒，确定了当时人是从事稻作农业的。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家猪的骨骼，表明家畜饲养是存在的。这些都与生活在海岛上的大帽山居民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目前县石山遗址的位置离海已经有20多公里远，而且遗址中发现的海生动物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对其经济形态中是否含有海洋经济成份，一直缺乏定论。

我们最近对1963年第六次发掘的县石山文化的23个人骨和第九次发掘的2个狗骨、1个猪骨和1个鹿骨进行的¹³C和¹⁵N同位素分析，使这一问题有了较大的突破。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县石山人在植物食物中以水稻为主食，但在消费的动物类食物中，却是以海洋动物为主的^[16]。这表明，县石山文化的海洋经济和稻作农业经济成份可能同等重要。古环境的研究也表明，当时的县石山是位于古海湾边的，所以海洋是县石山古居民重要的食物来源地也是情理之中的。

四 海洋经济的衰落与农业经济的再兴起

黄瓜山文化(4300~3500 BP)

继县石山和大帽山文化之后，在福建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兴起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黄瓜山文化。目前材料表明，黄瓜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闽江口到浙江南部的瓯江口一带的海岸地带，其年代为距今3500~4300年左右^[17]。

我们对黄瓜山文化的认识，目前主要依靠对黄瓜山遗址的两次发掘材料。在文化特征上，黄瓜山文化除了继承了部分县石山文化的因素外，相当部分因素来自内陆地区，其中以黑衣陶最为突出。在经济形态上，黄瓜山文化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尽管农业生产和海洋捕捞仍然并存，但海洋经济已经不再占主导地位，农业变得更为重要，并出现了大麦、小麦等新的农作物^[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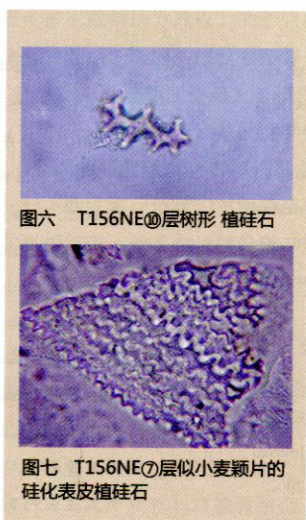
黄瓜山是一个贝丘遗址，包含大量的海贝和海洋鱼类骨骼，表明海洋仍然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根据我们2002年的发掘统计，黄瓜山居民至少采集15种海贝，其中以泥蚶(68.5%)和牡蛎(28.2%)为主。根据我们对泥蚶大小的对比研究，发现晚期的泥蚶明显以小型者居多。这很有可能是人类长期捕捞所造成的结果。

在发掘过程中，除了对部分堆积进行水选以外，我们还系统采集了土样标本进行植硅石研究。在早期的地层T156NE第9层中发现了6粒炭化的水稻谷粒(图五)。虽然大多破碎，但其形态仍表明是籼稻。这一观察也得到了植硅石的印证。水稻植硅石几乎在每层都有发现。在分析的17个样品中，都有水稻哑铃形植硅石。水稻叶片机动细胞扇形植硅石的底侧面布满龟裂纹，两侧向外突出，这种形态表明其亚种为籼稻。产生于水稻颖片的双峰形植硅石，多数以大块的硅化细胞(硅化骨架)形式出现在样品中，其形态与现代籼稻的双峰形极为相似；样品中双峰形植硅石出现的频度非常高，明显高于扇形出现的频度。随机统计了T156NE第9、10层中出现的双峰和扇形植硅石的频度，发现两者的比率分别为84:20和98:8。这种不同的频度分布似乎意味着人们更倾向于收获稻穗，而不是连同叶片一起收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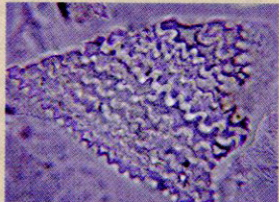
在黄瓜山晚期的地层中还发现了炭化的大麦(T156NE第4层)和小麦(T156NE第2层)的种子遗存(图五)。另外，在早期的地层中还发现了一种比较特



图五 黄瓜山遗址出土的大麦、小麦和水稻谷粒



图六 T156NE@层树形植硅石



图七 T156NE⑦层似小麦颖片的硅化表皮植硅石

殊的植硅石形态，如图六和图七所示。这种形态与小麦颖片的硅化表皮及树形(Dendriform)植硅石非常相似。这些材料表明，在黄瓜山文化的早期可能就已种植小麦。这是目前在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大麦和小麦遗存，对于研究大麦和小麦传播到中国的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家猪的数量占25%以上。这些迹象表明，农业和家畜饲养已经成为食物的重要来源。黄瓜山文化的居民已经日益依赖农业生产为生了。

五 福建沿海经济形态变化与原南岛语族的扩散

根据上述对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变化趋势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检讨经济的发展与人口扩散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对南岛语族最初迁徙的动因进行初步探讨。

以壳丘头文化为代表的福建沿海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其经济形态带有很强的海洋经济特征。居民基本以海为生，狩猎为辅。目前有关这一时期稻作农业的材料很少，或许表明农业在生计形态中不占重要地位。这一特点表明壳丘头文化与其发源的河姆渡文化在经济形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居民更加适应海洋。这或许是和壳丘头地处海岛的因素有关。由于目前缺乏海岸和陆地同时期的遗址，尚无法探讨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形态的差别。

海岛居民对海洋的适应能力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帽山文化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古材料表明，大帽山居民除了在岛上进行一些狩猎活动外，其食物来源基本来自海洋。同时，居民积极从事岛外贸易或交换活动，其航海的范围已经涵盖整个台湾海峡。这一时期以昙石山遗址为代表的海岸居民则发展出了不同的经济形态。海岸居民除了获取海洋资源外，还从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表现出多元的经济形态。

这种多元的经济形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瓜山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黄瓜山遗址地处海岸，居民虽然仍从事海洋捕捞，但其经济成份中的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比重似乎较大。在农作物种类中，新出现了大麦和小麦，表明福建沿海的农业经济作物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大麦和小麦的遗存也是目前所知的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最早的同类遗存。进一步探讨大麦和小麦传入福建沿海地区的途径和时间，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福建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于探讨原南岛语族的扩散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东南沿海与原南岛语族扩散有关的较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可能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河姆渡文化的中晚期，即距今6000~6500年左右；第二次可能在距今4500~5000年左右，主要是跨越台湾海峡的移民活动。从整个南岛语族的扩散历史来看，这两次人口移动是南岛语族的祖先首次向太平洋的扩散^[19]。而从经济形态的变化来看，这两次人口大移动均发生在海洋经济较发达时期，是与海洋经济和航海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海洋经济的发展和航海术的改进促进了人口的移动。目前的考古材料表明稻作农业所发挥的作用似乎不大，而且随着人口向海岸和海岛的迁徙，稻作农业变得日益不重要甚至被废弃。由于考古材料的缺乏，目前尚无法探讨不同时期人口的数量，人口压力是否是造成原南岛语族扩散的原因目前不清楚。

不过，有一个现象需要认真研究，即在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农业经济的日益重要，跨越台湾海峡的航海术似乎也开始衰落了。在黄瓜山文化之后，即距今3500年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化区别日益加大，表明两地之间的联系大幅度减少了。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作者系美国夏威夷毕士普博物馆考古部主任）

注释:

- [1] Bellwood, P. "Southeast China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onesians". In T. Jiao ed. *Lost Maritime Cultures: China and the Pacific*. Pp. 36~53. Bishop Museum Press, 2007.
- [2] Chang, K. C. & Ward H. Goodenough. "Archaeology of southeastern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In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the Pacific*. W. H. Goodenough (ed.). Pp.28~3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6.
- [3] 臧振华:《中国东南海岸史前文化的适应与扩张》,第20~33页,《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3期。Tsang, Cheng-hwa. "Maritime adaptation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blem of Austronesian expans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3, no.1~2. Pp. 15~45. 2002.
- [4] Jiao, T. *The Neolithic of Southeast China*. New York: Cambria Press.2007. 焦天龙、范雪春、林公务:《福建东山县大帽山贝丘遗址的发掘》,第19~31页,《考古》2003年第12期。焦天龙、林公务、罗莱:《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绝对测年及相关问题》,第36~40页,《福建文博》2004年第3期。焦天龙、范雪春、罗莱:《壳丘头遗址与台湾海峡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第8~12页,《福建文博》2009年第2期。福建博物院:《2004年平潭壳丘头遗址发掘报告》,第1~15页,《福建文博》2009年第1期。焦天龙:《东南沿海的史前文化与南岛语族的扩散》,第13~16页,《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 [5] 焦天龙:《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的变迁与南岛语族的扩散》,《东方考古》,待刊。
- [6] 王海明:《浙江南部先秦文化遗存浅析》,《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周年论文集》,第137~146页,西泠印社,1999年。
- [7] 焦天龙、范雪春、罗莱:《壳丘头遗址与台湾海峡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第8~12页,《福建文博》2009年第2期。焦天龙:《太平洋考古学与中国东南》,《百越研究》第二辑,2010年。
- [8] 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第541~550页,《考古》1989年第6期。Chang, K.C. "Taiwan Strait archaeology and proto-Austronesian". In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Pp.161-183. Taipei, Taiwan. 1995.
- [9] 焦天龙、范雪春、罗莱:《壳丘头遗址与台湾海峡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第8~12页,《福建文博》2009年第2期。福建博物院:《2004年平潭壳丘头遗址发掘报告》,第1~15页,《福建文博》2009年第1期。
- [10] 焦天龙、林公务、罗莱:《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绝对测年及相关问题》,第36~40页,《福建文博》2004年第3期。林公务:《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第41~50页,《福建文博》2005年第4期。
- [11] Guo, Z., T. Jiao., Rolett, B., Liu, J. Fan, X. Lin, G. "Tracking the Neolithic interactions in Southeast China: evidence from stone adze geochemistry". *Geoarchaeology*. Vol.20. no.8: 765~776.2005. Guo, Z. and T. Jiao, "Searching for the Neolithic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otopic evidence of stone adzes from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2(1): 31~40. 2008.
- [12] 福建博物院、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福建东山大帽山贝丘遗址的发掘》,第19~31页,《考古》2003年第12期。福建博物院:《福建东山大帽山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第1~20页,《福建文博》2006年第4期。
- [13] Jiao, Tianlong & Kuangti Li, "Isotope analysis of marine shells of the Damaoshan site". In T. Jiao e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eolithic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ishop Museum, 2007.
- [14] Guo, Z. & T. Jiao, "Searching for the Neolithic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otopic evidence of stone adzes from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2(1): 31~40. 2008.
- [15] 福建博物院:《闽侯县石山遗址》,科学出版社,2004年。林公务:《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第41~50页,《福建文博》2005年第4期。
- [16] Krigbaum, John. & Tianlong Jiao, "Ancient human diet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China: new staple isotope data from Tanshishan". Presentation at 19th Congress of Indo-Pacific Prehistoric Association, Hanoi, 2009.
- [17]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发掘报告》,第3~37页,《福建文博》1994年第1期。焦天龙、林公务、罗莱:《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绝对测年及相关问题》,第36~40页,《福建文博》2004年第3期。
- [18] Jiao, T. *The Neolithic of Southeast China*. New York: Cambria Press.2007.
- [19] 焦天龙:《太平洋考古学与中国东南》,《百越研究》第二辑,2010年。焦天龙:《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的变迁与南岛语族的扩散》,《东方考古》,待刊。



闽越史新探五题

MINYUESHI XINTAN WUTI ■ 文王振镛

汉闽越国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在正史中被记载的地方政权。关于它的历史记载，首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但也仅有一千余字。其后，班固的《汉书》等史籍虽有些许增益，也仍是十分贫乏。我们今天研究闽越历史，首先要依靠《史记》、《汉书》等早期正史文献。但是，司马迁编纂《史记》的时候，用的还是竹简木牍，他的文字也只能尽量简约，真所谓“言简意赅”。故此，同一则史料，今天的研究者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得出不同的结论。近年来，有关闽越文化遗存的考古材料不断发现，使我们对闽越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新进展。本文也力图通过文献史料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就其中一些问题，提出粗浅看法，就教于读者、方家。

一 说“闽”与“闽越”

“闽”是先秦时期生活在今福建及其周边地区的土著居民的一种他称。“闽”的古音与“蛮”相近，是同声字，可以通假，都是先秦中原人对南方诸族的称呼。所谓“南蛮”，同“北狄、东夷、西戎”一样，都是上古中原华夏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泛称。“闽”即是南蛮中的一部分。“闽”也是地名或方国名称。《周礼·秋官》“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言传之”。闽方国臣服于周天子，并派国使以时入宾，实为朝贡和入质或服役，所以《周礼》中又有“闽隶百有二十人”的记载。在福建建瓯、建阳、浦城、光泽、福州、南安、武平等地曾有商周时期墓葬和青铜礼器、兵器发现，可以证明上古闽人方国的存在。

上古闽地可能有多个方国。在福建，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在各地都有发现。《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分册》共登录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约2500多处，分布于全省各市县，闽北各地尤其密集。其中，文化特征比较突出的有夏商时期的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黄瓜山文化和分布于闽北地区的马岭——猫儿弄类型文化，有商周时期的分布于九龙江流域以北广大地区的黄土仑文化诸类型遗存和分布于九龙江流域的浮滨文化虎林山类型遗存，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分布于闽北、福州等地的以灰色印纹硬陶和青铜兵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周礼·夏官》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七闽”可能是指上古闽地比较强大的几个方国，如闽北、福州等地的方国。其中闽北的一个方国，其都邑可能在今建瓯一带，该地曾出土商周青铜礼乐器多件，应是比较重要的方国之一。

“闽越”是秦汉时期对福建一带的称呼。当时，中原把南方各族称为“百越”，《吕氏春秋·恃君》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头之国，多无君”。闽地诸方国也多属于类似部落联盟的没有世袭君王的初级土邦。战国时期，楚击越，杀无疆，于越贵族南渡浙江，进入浙南、福建一带七闽地区，逐渐融入闽人社会，并取得了领导权，出现了以闽人为基础，以于越贵族为社会上层权贵的统一的地方国家，即闽越国。无诸就是这个地方国家的最后一个王。《春秋集览》说“越人居闽地，故并称闽越地”，所以“闽越”是地名，是国名，而不是族名。

二 无诸系勾践后裔考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勾践卒，子王鼯与立。王鼯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疆立……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世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史记·东越列传》更明确指出“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

驹氏”。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司马迁的有关记载，为的是避免造成断章取义之嫌。根据上述记载，勾践至无疆已有六世，如果把“后七世，至闽君摇”理解为从勾践算起后七世^[1]，岂不等于说闽君摇是无疆的子侄辈吗？从楚击越，杀无疆，至汉初闽越、东海立国，其间有百余年，无诸、摇不可能是勾践之后七世裔孙。根据《史记·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在之侯与无疆之间还有在位短暂的三王（错枝、无余之、颡），所以，勾践之后至无疆应为六世九王。从无疆继位至汉初无诸复立为闽越王，即从公元前356年至前202年，共154年。古人早婚早育，每世若按20~25年计算，那么，无疆至无诸、摇应有六、七世。所以，《史记》的“后七世”应从无疆算起，是无疆后七世，而非勾践后七世。只有这样解读，才能使无诸及摇“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的问题迎刃而解。

闽越国王室出自南下的于越贵族，系越王勾践后裔，这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证实。2001年在武夷山市城村闽越王城遗址东北约2000米（崇阳溪北）的牛山（交椅山）顶部发现一座汉闽越国时期的大型贵族墓葬（牛山1号）。该墓独占一个山头，封土堆作长方形覆斗状，人工夯筑，其底边东西长46米，南北宽33米，墓口以上残高7米。顶上东西长4.6米，南北宽3.3米。封土堆下的竖穴土（石）坑墓室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外藏椁、甬道和墓室（椁室）组成，通长32米，其中墓室东西长10.2米，南北宽5米，漆棺和木椁已腐朽，木椁长9.6米，分前后室，前椁长方形，长3.4米，宽2.1米，高约2米。后椁为主室，长6米，宽2.8米，高约3米，为两面坡“人”字形结构。椁室外填塞0.2~0.4米厚的木炭^[2]。此墓是福建省已知的最大汉代墓葬，形制特殊，同绍兴印山越王墓相似，由此可以判定其与东周越国王室之间有文化传承关系，有力地说明了闽越国王室同越王勾践确系同种同文。

南下的勾践后人，于越贵族在统一闽人诸方国，建立闽越国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统治中心，一在闽北，是军事指挥中心，一在福州，是行政中心。无独有偶，近年在福州北郊新店益凤村边益凤山上也发现了一座福州地区已知最大的汉代墓葬^[3]。该墓虽然已被盗掘殆尽，其形制仍保存完整，同武夷山城村牛山1号墓相似，唯规模稍小一点，在福建也堪称第二。据推测，其墓主也可能是闽越国王室成员，抑或就是东越王余善，因为该地正属府城东北宁棋里，与明代《八闽通志》、《闽都记》记载暗合。南越国赵氏王室来自河北真定，广州象岗南越文王赵胡墓的形制就与中原常见的大中型西汉

墓相似。由此可见，《史记》等史籍说闽越王无诸、东海王摇和南海王织皆为越王勾践后裔，可谓信而有征。

三 秦闽中郡考

《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驹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司马迁父子作为汉太史令，长期侍从汉武帝左右。司马谈距秦并天下不过七、八十年，关于秦置闽中郡一事，不至于向壁虚构。司马迁继承父职，也必有所本，应当是历史实际。虽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没有明确记载秦何时置闽中郡，但是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也应是历史事实。据王国维考证，这三十六郡中应包括闽中郡在内，他认为“始皇本纪系降越君于二十五年，则闽中郡之置当是在是年，本纪但书降越君，置会稽郡，又有所略也”^[4]。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指出：“其初虽有郡名，仍令其君长治之，如后世羁縻州之类”。我认为他们的看法是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试想，如果秦没有用兵闽越，无诸、摇等怎么能被废为君长呢？《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说王翦“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始皇本纪》也提到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王翦的“南征百越之君”应包括了浙江以南的无诸及摇等。正是因为秦乘胜进军闽越，兵临城下，无诸等闽越王侯贵族不得不归降，朝廷则对他们实行了不同于会稽郡的政策，置郡而不置县，也不委派守、尉、监等封疆大吏，而是将无诸等王侯废为君长，继续管理闽中郡。岭南三郡置于始皇三十三年，与此次战事无关。闽越地接越江南地，会稽郡置于二十五年，则闽中郡也可能置于该年，最迟不会晚于秦始皇诏书所说兼并天下的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

《史记·东越列传》说“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可以认为“无诸、摇率越人佐汉”，完全是为了雪耻或复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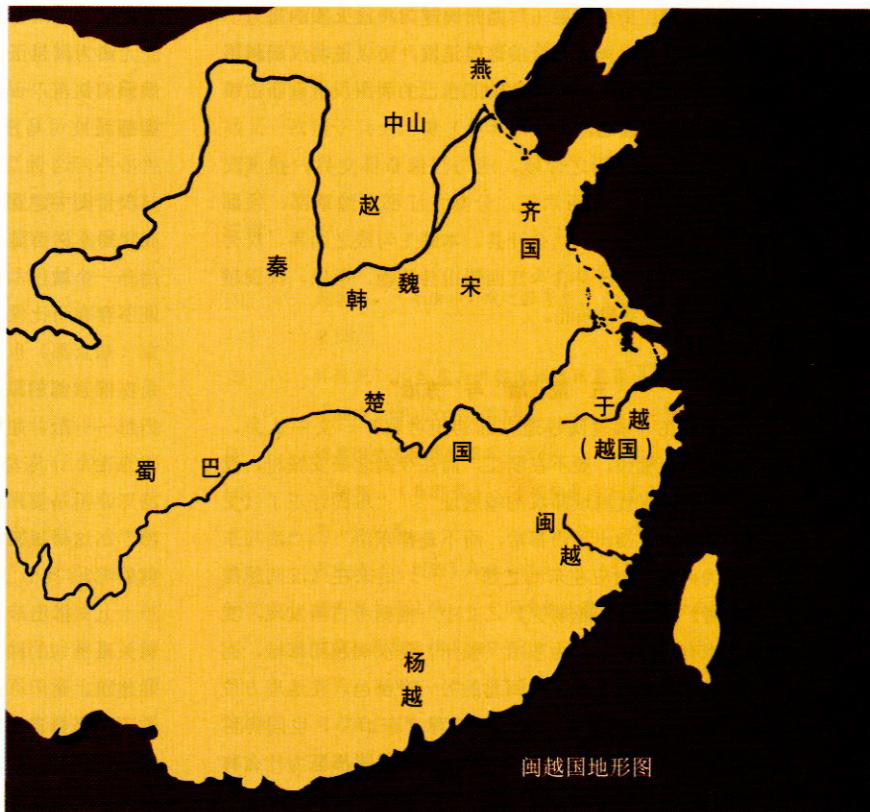
由于统率秦军入闽的并非王翦，所以司马迁就没有把灭闽越、置闽中郡这件事系在《王翦列传》中，而是在《东越列传》中记叙。

秦闽中郡的疆域，主要是今福建及浙南台、温、处这一片地方。其北是秦会稽郡地，其南粤东系秦南海郡地，其西今江西系秦九江郡地，都不属于闽中郡版图。

四 闽越国疆域考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吴故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所谓江南海上，指的是浙南东部沿海台、温、处三府地以及福建和粤东的部分。岭南大部分属“缚娄、阳禺、驩头之国”，即所谓南越地区。闽越之西，春秋时期是所谓“吴头楚尾”，至战国时期，已是楚国的地盘。

汉闽越国的版图略有缩小。先是粤东东部沿海地区，秦代及赵佗自立为王，割据南越时期属南海郡地，汉南越国时期为南海郡揭阳县地。福建南部漳（州）龙（岩）一带原先也是南越国领土。汉高祖十一年，为讨平陈豨、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的叛乱，消除南境压力，乃遣陆贾出使南越，立赵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刘邦“击英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5]，知道自己将



闽越国地形图

不久人世，同时闽越王无诸刚去世，于是在高祖十二年，分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是为汉南海国，裂土分治，以削弱日益强悍的闽越和南越两个异姓诸侯国。汉南海国的领地主要在福建南部九龙江以南漳龙地区及粤东潮（州）梅（州）地区。因潮（州）梅（州）一带是秦及南越国的属地南海郡的一部分，滨临南海，所以才称织为南海王。但是当时赵佗割据岭南三郡，高祖刚承认其为南越王，南海王可能并未实际控制粤东，只是遥领而已，实际领有的只有岭北漳龙及赣南一带。20世纪90年代在九龙江南岸，龙海市榜山镇雩林山上发现一处西汉初古城址，可能就是汉南海国所筑的军事城堡遗址^[6]。南海国于汉文帝时因谋反被除国后，闽越国又占领了九龙江以南至梁山一带土地。现云霄县梁山盘陀岭上尚存两国间的关隘——蒲葵关遗址^[7]。以上是汉闽越国南界变动的情况。

关于汉闽越国北境的今浙南温、台、处三州地，原先也是无诸的领地，但是无诸死后不几年，闽越国新王又被弟甲所弑^[8]，汉朝廷又乘机实施裂土分治，于“孝惠三年（前192）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于

是温、台、处三州地就成为汉东海国的领地。至“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9]。这里所谓“闽越引兵而去”是指东海国都邑东瓯解了围。东瓯城位于今浙江台州黄岩之南的温岭大溪^[10]。闽越要包围东瓯，先要占领东海国的部分领土，以便打通进兵通道，保障后勤供给，否则就无法围困东瓯。东海迁国后，其领地又被闽越国占领。建元六年，汉武帝立丑为越繇王，之后，闻余善“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认为不足兴师征讨余善，朝廷鞭长莫及，十分无奈，“固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11]。所谓“东越”，应包括了闽越与东海两国的领地，这等于认可了闽越国对原东海国领地的并吞。实际上，直至闽越国灭亡，汉朝廷也未在原东海国领地上设置任何政权机构施行管理，至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始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分冶县地而置）。此外，《汉书·严助传》说过“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闽王以八月举兵于治南，士卒罢倦，三王之众相与攻之”的话，此处所谓“两国”，即指闽越国

和前南海国；所谓“三王”是指闽越国和已灭国的南海、东海两国遗民。《汉书》的这段记叙，可以说明汉闽越国不但将原南海国的部分领地纳入自己的版图，也重新占领了原东海国的领地。

至于汉闽越国之西境，应与汉豫章郡交界。据《汉书·地理志》，高帝六年，分秦九江郡置豫章郡，领鄱阳、余汗等十八县。“余汗县，本越王勾践之西界，汉为余干县。”汉余汗县含今江西铅山县等地。所以，汉闽越国版图实未包括赣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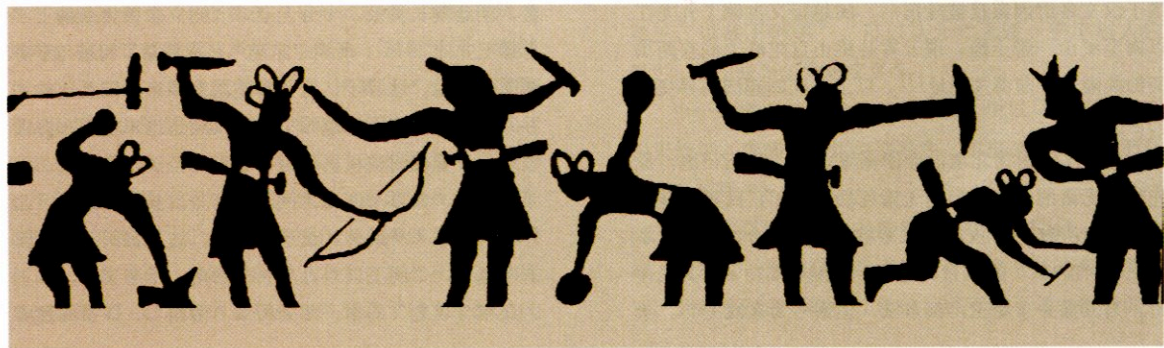
五 说“冶”与“东冶”

我曾在《福建闽越遗存的初步考察》一文中认为，“冶城不在福州，更不在浙江，而在今闽北崇安城村，我们所发掘的汉代城址即汉冶城遗址”，“班固订正了《史记》的错误，指出无诸都冶，而不是都东冶”，“冶与东冶实为两地，冶应在东冶之西”^[12]。后来在《汉闽越国都城考》及《论闽越研究》二文中，根据考古新发现，我的观点有所改变，认为东冶（福州）是汉闽越国都城，而冶（城村）是汉闽越国在闽北的另一个都邑。在地理方位上，福建位于武夷山之东，所以称“东冶”，也同样称“冶”^[13]。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闽越国都邑为什么称“冶”。这个问题还须深入探讨。

“冶”即冶炼，以“冶”为地名，应与铜铁冶铸有关。宋梁克家《三山志》说欧冶地“相传闽越王无诸淬剑处，在今校军山之北，昔冶山之麓也。”曾意丹君认为“冶都之名恰恰是因冶山、欧冶池而得名的”。不少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14]。此类说法传说色彩太浓，缺乏考古及早期文献方面的依据。《吴越春秋》指出“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作名剑五枚。允常传数世至无疆，国灭于楚，乃西徙居闽，又数世至无诸，乃复封王，或冶剑于山，淬剑于池，故皆以冶名。但非越王与欧冶子耳。”可见将春秋晚期的欧冶子与战国晚期的无诸扯在一起，并把屏山下的一座小山和一个池子称为“冶山”、“欧冶池”等等，实出

后世文人的附会。闽越地区之有“冶都”，并非始于汉复立无诸为闽越王。早在秦汉以前，今福州一带就出现一定规模的都邑，否则汉闽越国就不可能“都东冶”了。闽越国都城被司马迁称为“东冶”，说明闽越还有一处都邑“冶”，这个“冶”一定位于“东冶”之西。劳干先生在《汉晋闽中建置考》中说“冶在中国之东，故亦称东冶，亦犹蜀亦称西蜀，羌亦称西羌”^[15]。这样解释实属不通。冶是一个城邑，而蜀或羌是一个大区域或一个方国，二者间不存在可比性。张其海先生说“例如今日本国的首都东京（东京都）也是为了区别旧都——京都，因东京（都）是在旧京都的东方”^[16]。所以，在东冶之西，应有一个旧都——冶。如果旧都是在福州，那么福州就不应被称为“东冶”，应称为“冶”，而西边的都邑则应称为“西冶”。但是福州在《史记》等史籍中确实确实被称为“东冶”。这样说来，东冶应是闽越新都。那么，闽越旧都在何处呢？

上文指出，“冶”应与冶铸有关，在古代福建，与冶铸关系密切的地方，根据考古发现，当首推闽北地区。闽北建瓯、建阳、武夷山、浦城、松溪、政和等地，都出土过不少先秦青铜器和秦汉铁器。北邻的浙江龙泉至今还是我国铸剑名县。2006年在浦城管九发掘清理了三十余座商周时期土墩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剑等兵器和少量礼器^[17]。这批青铜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显然是先秦闽地自铸产品。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城遗址，自1959年首次发掘至今已在城址内外出土各类铁器400余件^[18]。其中农具有锄、锄、镢、镰、犁、五齿耙等，手工业工具有斧、斤、镑、锤、凿、削、釜、锯、钎、钉、钩、凿形器等；兵器有剑、戟、矛、镞、刀、匕首、钺、铍、铠甲等；生活用具有匙、釜、三足釜架等；建筑构件有大小铺首、门环、门臼等；其它杂件有圈、环、链、镣铐、小铲、拨铲、齿轮、鱼镖、方形器、叉形器、钩形器、树形器等等。除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铁制品外，在城址内外经调查探掘，发现冶铁遗址有城内下寺岗制铁作坊遗址及城南福林岗、黄瓜、



城西元宝山、赵厝圩冶铁遗址等5处^[19]。

闽越地区除上层贵族外，不少臣民也是吴越遗民，他们对吴越的冶铸业并不陌生。《越绝书》有楚王请欧冶子、干将铸龙渊、太阿、工布等宝剑的故事。《吴越春秋》中也有越王允常聘欧冶子铸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钧等五剑的记载，铜铁冶铸正是越人所擅长的技艺。而且，闽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充足的燃料及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城村一带形成冶铸业较为发达的城邑——冶城，这是战国时期闽越国的第一个都城。另一个都邑在东部沿海的福州——东冶。

从福州历年来的考古发现看，除了所谓欧冶池和冶山是无诸铸剑的传说外，并未发现真正的冶铸遗址，也没有多少青铜器和早期铁器出土。既然如此，为什么古代福州也被称为“冶城”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战国秦汉时期福州也是闽越国都城之一，完全可以沿用旧都“冶”的名称，这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商曾五迁其都，皆称“亳”，楚也多次迁都，也都称“郢”。楚击越后，于越遗族南下闽地，首先立足之地就是浙南、闽北。早在商周时期，闽北地区就同吴越地区就有密切联系，两地的土墩墓、青铜器及原始瓷等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安徽皖南屯溪M3所出1号剑，通长34.3厘米，茎上三箍，近剑格处饰两扉耳，同2006年浦城管九土墩墓所出的那批青铜剑同属一个类型。闽北各地先秦遗存分布十分密集，整个南平市已登录《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分册》的青铜时代遗址有743处，秦汉遗址15处。这些都可以说明当时闽北人口较多，聚落星罗棋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相当水平。这是城邑出现的必要条件，也是闽越贵族建都立国的首选之地。福州位于闽江入海口，交通方便，先秦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达一定水平，全市已登录的青铜时代遗址有110处，秦汉遗址5处^[20]，城邑的出现也较早。战国时期，闽越国在此建立了另一个都邑——东冶。

秦始皇二十五年，秦置会稽郡之后，秦兵即南下进击闽越，地处闽北的冶城必先陷落，毁于战火。远在福州的东冶就成为以无诸为首的闽越贵族的最后巢穴。在兵临城下的态势之下，无诸他们无力回天，为了保存自己，只好同意被削去王号，废为君长。秦虽然在闽越故地上设置一个闽中郡，实际上并未委派守、尉、监等一班官吏，亦未设县实施郡县制，一切仍由无诸、摇等管理。这样，东冶的战事和平解决，取得了双赢的结局，东冶城邑也没有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这是与闽北不同之处。所以，20年后，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时，就定都东冶。司马迁说汉闽越国“都东冶”并无错误。冶在闽北、东冶在福州。无诸复国后，尤其是郢、余善为王的汉闽越国后期，为防御

军，又重建了武夷山城村的冶城，虽然名义上已丧失了正统地位，却成为穷兵黩武的郢、余善在闽北前线的统治指挥中心。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击灭闽越，该城又一次毁于兵火。■（作者系原福建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注释：

- [1] 蒋炳钊：《无诸非勾践之后考》，《福建文博》2003年第1期。
- [2] 林连芝：《武夷山闽越王城遗址墓葬考古新收获》，《福建文博》2005年第3期。
- [3]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考古资料。
- [4] 王国维：《秦郡考》，《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
- [5]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 [6][7][20]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分册》，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7年。
- [8] 班固：《汉书·严助传》。
- [9][11] 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 [10] 陈元甫：《浙江温岭汉代东瓯国城址与贵族大墓》，《东方博物》第二十五辑。
- [12] 福建省博物馆编：《闽越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 [13][14] 王培伦、黄展岳主编：《冶城历史与福州城市考古论文集》，海风出版社，1999年。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建省文化厅编：《闽越文化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 [15] 劳干：《汉晋闽中建置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册，1935年。
- [16] 张其海：《闽越国“冶”都探究》，《闽越文化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 [17] 见《福建文博》2007年第2期。
- [18]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 [19] 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杨琮：《武夷山闽越故城出土铁器的初步研究》，见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